

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四论

苗怀明

一、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以往的文献学研究往往涵盖文史哲多个学科,研究者较多地强调文献之间存在的共性,对各个学科文献的特殊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采取大而化之的做法。在现代学科分工日益细致、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一般文献学的研究不仅难以解决各个学科文献所存在的具体问题,难以满足研究者了解、利用各个学科文献的内在需要,而且有的时候甚至连指导也称不上。因此,有必要专门针对各个学科自身的特点,对其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其他一些学科领域早已相继提出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法律文献学等概念,并有多部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出版,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谢国桢的《史科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杨燕起、高国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高潮、刘斌的《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伯元的《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也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下提出的。

除了学科自身的特殊性之外,特意强调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与戏曲、说唱文学等同属通俗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如诗文辞赋等的文献在产生、分布、保存、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系统,因此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文学文献学、史科学、目录学之类概念的提出已颇有些年头了,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比如潘树广的《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谢灼华的《中国文学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孙立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查洪德的《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在指点门径、提供学术信息方面自有其建树,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也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从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这一角度看。具体说来,原因有二:

首先,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大多非通俗文学研究者,有些甚至非古代文学研究者,其文学文献学著述主要依据诗文辞赋为代表的雅文学立论,对小说这类通俗文学涉足较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不熟悉乃至不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膜,因而对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献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未能在其研究成果中充分体现出来,所总结文学文献学的一些规律及研究方法自然也难以有效地涵盖小说等通俗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并不具指导意义,甚至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也不够准确。

其次,就文学文献学这一领域的整体研究而言,因重视程度不够,过于偏重实用,缺少应有的学术含量,仍停留在开书目、检索利用的初级阶段,从学术层面进行系统、深入把握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无法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哲学学科的文献学研究相比。

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深入、细致地对小说乃至戏曲、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文献进行探讨,可以大大丰富文学文献学的内涵,使人们对文学文献学有着更为全面、真实的认识,进而可以为其他学科文献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不仅可以成立,而且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并非可有可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强调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学文献的特殊性,但并不否认它与其他样式文学文献乃至其他学科文献之间的共性。对研究古代小说文献的学人来说,具备较为系统、扎实的文献学基础及技能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素养,是研究的前提基础。

再次,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的研究直到目前还不够充分、完善,还有比较大的开掘空间。

回顾小说研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前辈学者如胡适、鲁迅、孙楷第、郑振铎、马廉、阿英、赵景深、王古鲁、谭正璧等在古代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大多下了很大功夫。每当有重要古代小说文献的新发现,比如《三国演义》嘉靖本、《金瓶梅》词话本、《红楼梦》甲戌本的发现、《续录鬼簿》有关罗贯中史料的发现等,都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撰写了不少研究著述,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小说研究的重要收获,体现着小说研究的学术水准与特色。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已有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个别、具体文献的辨析和梳理,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一直缺少从学科角度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概括,比如小说史料的产生和分布有何特点,小说创作、刊印的流程与

特点如何,小说目录的编制、作品的校勘整理、真伪辨别有哪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古代小说文献的诸种特性对小说的文本形态有那些具体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理论层面的研究并不是古代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全部,只是因这一部分研究较为缺乏,笔者有意进行强调。

以目录的编制而言,如果像诗文辞赋那样,仅著录作者、卷数、版本等基本信息是不够的,因为这样提供的信息量太少,人们无法据此对相关作品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再者,一些不同样式的作品较多出现同名现象,仅靠这些简单的信息也难以区分、辨别。因此,小说作品目录的编制需要充分考虑小说自身的特点来进行。此外,小说目录在整个目录学体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比如校勘整理时底本的选择问题,对不少通俗小说作品来说,未必像人们通常所讲的那样,版本年代越早越好。实际上即使想这样做,也未必行得通,因为不少小说作品版本众多,不少年代未明,很难辨明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找到最接近原貌的版本。还有不少作品为海内孤本,不管其刊刻、抄写是否精良,在校勘整理时没有选择底本的余地。由于作品的形态不同,校勘整理的原则自然也不尽相同,比如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作品的整理就是如此,应区别对待。

再比如在小说作品的整理过程中,不少小说出现史实、地理等方面的错误,对历史著作或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来说,可以进行校正。但对以虚构为特色的小说来说,是否有必要予以纠正,这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沈伯俊先生在校勘整理《三国演义》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种校理法^①,这种方法在其他样式文学作品的整理中是不常见的,反映了古代小说文献的独特性。

古代小说文献的诸多问题也不是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刘世德先生曾提出建立古代小说版本学的一些设想,并撰文对古代小说版本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特点、功能、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②。程毅中先生也曾出版《古代小说史料漫话》一书,探讨古代小说的史料问题^③。但与小说其他分支的研究相比,无论是人员的数量,还是时间和精力投入,都要少得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没有形成应有的规模和气候。与其他样式的文学文献研究相比,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显得有些冷落,而且也有些落

①沈伯俊:《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7月)。

②刘世德:《关于古代小说版本学》,《〈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③程毅中:《古代小说史料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古代小说史料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后。

一百多年来,古代小说文献不断被发现、搜集和整理,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古代小说文献平台,对整个小说研究学科产生了良性的推动作用。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古代小说文献对传统文献学构成了颠覆和挑战,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因此,提出古代小说文献学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部需要,同时也是一个较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断努力,学术积累丰富,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和参考,因此,从学科角度、理论层面研究古代小说文献的条件也已经具备。

就笔者浅见,古代小说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小说史料的来源、形成、分布及其特点,古代小说的刊印、版本与传播,小说目录、索引的编制与研究,公私古代小说文献的收藏与保存,小说作品的辨伪、辑佚,小说作品、论著的校勘整理与出版,古代小说文献的汇编、检索和利用,小说数字化研究。

二、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诸种特性

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主要样式,小说与戏曲、说唱文献存在着许多共性,但也有一些独特性,就其产生、分布、传播、形态等各方面而言,其中有如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古代小说文献存在的非完整性。与诗文辞赋等文献相比,古代小说文献先天就存在不完整性。这主要是因为:小说在中国古代被视为淫词邪说,受到主流社会和正统思想的歧视,长期处于被排斥和打压的状态,作品的创作并不能给作者带来荣誉,相反倒可能惹出祸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朝廷屡屡查禁小说,创作、刊印、阅读皆被禁止。因此作者本人有意隐瞒个人的真实身份及创作情况,以天花藏主人、兰陵笑笑生之类的笔名掩护自己,不想让外人知道,绝不是个别现象。一些小说的作者情况在当时人们就弄不清楚,今天更是大多难以知晓。这一行为本身使古代小说文献在生成之初就留下巨大的空白,作者尚不知道是谁,至于创作思想、经历、成书经过等等,更是难以知晓。

即使作者不隐藏自己的身份,想留下一些个人资料,但往往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因为多数作者身份卑微,难以进入官方的各种档案或典籍中,不容易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的忽略,即使是本该记载、保存的资料也被有意过滤掉,这样就形成了古代小说文献的第二层空白。比如《四库全书》号称网罗天下典籍,却不收通俗小说,有意将其排斥于当时的知识体系之外。

再者,即使有一些作者、版本等方面的资料被记载下来,但这些文献通常不仅不能得到有意识的完整保存,反而被人为破坏,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少。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散失,这就使得残存下来的古代小说文献注定不够系统、完整。相比古代小说创作的规模、繁荣的程度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现存文献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显得十分单薄。

文献的缺乏无疑会对相关研究形成制约,尽管数代研究者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搜集起来的资料往往呈零星状态,缺少系统性,存在很多空白,而且大量空白注定是无法填补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资料的缺乏使作者的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再也无法取得进展。《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也因资料的严重缺乏而难以有更大的突破。至于那些民间戏曲及说唱作品,作者、版本等问题的研究因资料的缺乏几乎无法进行。比如车王府唱本中的多数作品都无法知道作者的姓名。

二是古代小说文献分布的零散性。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受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和正统思想的歧视和打压,加之大多印刷粗陋,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记载、有意识的搜罗和保存,小说作家的社会地位低,其个人资料在各类官方文献中也很少记载。因此这方面的文献很少集中出现在某一种典籍中,而是往往零星散布在笔记野史、文集、方志等各类书籍中,没有特别明显的规律可寻。即使是这些零星的记载,也往往只言片语,语焉不详,而且并非都是有意识记载的,往往在谈论其他事情时随带提及。这就为资料的搜集整理带来很大困难,工作的难度较之诗文辞赋等要大得多。

三是古代小说文献记载的随意性。这个特点是由前面所说古代小说文献的不完整和零散性而来的。现存的古代小说文献被有意识记录下来的并不多,作者在记载这些材料时,本来就有不少是道听途说而来的,并非本人亲眼所见,加之记录时并没有明确的史料意识,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不少材料的内容荒诞离奇,不合常理,可信度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还存在着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有多个完全不同的记载,比如《金瓶梅》的作者,明清两代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出入。不少材料相互之间存在矛盾。

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那些具有民间传说性质的文献,也是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类文献所占的比例并不小。序跋固然是研究小说作品的第一手文献,但它往往出于书商之手,或书商雇人所写,其中有不少故弄玄虚及广告宣传的成分,其可信度也是要打折扣的。

四是古代小说文献内容的不均衡性。古代小说文献能够保存下来的本来就不多,但就是这些文献,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内容上存在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来说,宋元之前的古代小说文献较少,明清两代的相对较多些,这也是古代文献的一个共性,时间越早,文献散失就越多。就古代小说文献内容的分布而言,大多是关于作品的接受和传播的,有关作者、版本方面的记载太少,很不均衡。

五是古代小说文献形态的易变性。就诗文辞赋来说,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其内容形态通常是较为稳定的,除了作者之外,一般不会有其他人有意进行改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差异往往是由传抄、刊刻造成的。但古代小说文献则不然,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故意改动,有的是艺人出于表演的需要,有的是书坊主为了牟利,比如改换书名,任意增删内容,形成繁本、简本,有的是

评点者的人为改动,比如金圣叹在批点《水浒传》时,对作品文字进行了大量的改动,有的则是抄写人擅自的改动。总之,小说特别是经典作品的版本异常复杂,辨析版本的渊源流变十分繁难。

上面归纳的是古代小说文献的几个主要的特点,所有这些使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成为一项颇为艰巨的工作。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小说文献时,要充分考虑其特点,找到适合的方法:

首先,从心态上来说,对古代小说文献的缺乏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因为依据现存的文献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些问题注定是空白,无法解决的。在研究中,要善于搁置一些繁难问题。

其次,针对古代小说文献存在的不完整性及分布的星散性,要扩大文献的搜集范围,这种范围不限于学科,也不限于国界,要从各类典籍中细细搜罗,得到点滴的资料都要注意保存下来,然后把这些零星的材料进行整合。

再次,针对古代小说文献记载的随意性和变异性,对搜集到的资料要进行认真的辨伪工作,不能不加选择的利用。准确地理解文献尤其重要,不少学术争论就是对文献理解的分歧引发的。特别是那些类似于民间传说的文献,不能因为材料的稀缺而滥用。

总的来看,古代小说文献学应该具有如下两种学术品格:

一是学术性。古代小说文献学是立足于小说的文献学研究,与小说文本研究、小说文化研究一起,构成小说研究的核心内容。它结合小说研究自身的特点,对古代小说文献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加深对小说自身的认识,为小说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奠定这一学科的重要文献基础。

一是实用性。无论在哪个学科,文献研究都是一个基础工作,它是为整个学科服务的,因此,古代小说文献学应该具有实用性,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可信、完备的资料和信息。

三、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数字化

随着电脑及网络的日益普及,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人们的生活及工作方式无不受到电脑、网络的深刻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当下结合得如此紧密。就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而言,数字化带来许多新的机遇,它潜在地改变着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

总的来看,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便利是不言而喻的,就笔者个人的体会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储携带的便捷。文献的数字化使原先让研究者颇为头疼的文献存储和携带问题彻底解决。如今一个移动硬盘或U盘,完全可以将一个小型或中

型乃至大型图书馆存入囊中。就现存的古代小说作品、资料乃至研究著作而言,完全可以装在一个小巧的移动硬盘里。这样,在文献数字化的时代里,研究者可以将个人所需要的资料以一种极为便捷的方式存储和携带,阅读、使用起来也十分方便,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学者们的研究更有效率。

二是强大的检索功能。这是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最为明显的便利之一,也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个功能。随意输入一个关键词,轻轻敲击一下键盘,短短几秒之内,就可以在成千上万种典籍中准确无误地找到其出处及所有记载该词的地方。只要数据库足够大,完全可以实现对中国古代所有文献的检索。在可以想象的将来,随着文献数字化的普及,随着电子数据库的完善,小说史上一些带有实证性的疑难问题如作家的籍贯、生卒年、交游、著述等,都将得到很方便的解决,由此带来小说研究的一些新突破,这是可以期待的。事实上,据笔者的体会,利用现有的资料库,还无法解决罗贯中、施耐庵、兰陵笑笑生、脂砚斋等相关疑难问题,但要查找一些不太流行的小说作者或序跋作者、一些作品的本事及流传等,还是可以找到不少东西的。

三是先进的计算统计功能。除了存储和检索外,人们还可以借助电脑先进的计算统计功能,进行学术研究。比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借助电脑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语言风格进行统计,从而为解决作者问题提供证据。尽管当时由于技术及设计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并不是很成功,但这一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代表着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如今,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完善,只要研究方案设计合理,完全可以借助电脑的先进计算统计功能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此外,借助电脑和相关软件,编纂辞书、编制目录、索引等工作变得十分便捷,一个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此前很多人需要长时间来做的工作。以朱一玄先生等人所编纂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为例,这是研究者常置案头的一套重要参考书。为编纂这套资料汇编,朱一玄先生等人所付出的大量艰辛劳动是可以想见的。自然,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其中也难免存在一些遗漏和缺憾。如今只要利用电子检索手段,就可以很轻松地在这套资料汇编作数量不小的补遗。

四是直观形象的显示功能。如今电脑网络与其他媒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功能十分先进、强大的多媒体,使很多较为枯燥、烦琐的东西可以以一种十分直观形象的方式显示出来。比如电子地图,其生动形象的显示效果、方便快捷的操作方式是以往的纸质媒体无法匹及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人物、军队的行动路线,可以很方便地借助电子地图显示出来,用在科研和教学上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再比如版本的比勘。以往小说版本的比勘大多以校记的形式显示,完全对应式的显示在排印上有着很大的难度,如今利用电脑,可以很方便地加以解决。近年来,周文业先生致力于《三国演义》版本软件的开发,并逐步拓展到其他小说作品的版本上,在此方面已有不少创获。

总的来看,随着科技的高度和普及,文献数字化的优越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展现。包括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回避这些高科技手段和媒介,也不应该回避,而是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来推动学术的良性发展。

不过,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高科技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和好处还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准确地说,现在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其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些现象值得注意。就笔者个人所见所闻,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缺少全局的计划和部署。就当下古代小说文献的数字化发展情况而言,基本上是处于诸侯割据的无序状态,既有文化公司的商业开发,也有事业单位的项目研究,更有爱好者的公益劳动。尽管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建设了一批优秀的数据库,开发了一些很好的软件,但从全局来看,缺少合作和协调,相互分割,标准不一,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劳动,所有这些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文献数字化未能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水准。

其次,缺少专门的人才。古代小说文献的数字化开发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对相关人才的要求比较高。它要求开发者既要有熟练的计算机基础,同时又要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小说研究有较多的了解,自然最好是学界中人。否则纯技术人员开发出来的东西会存在很多缺陷,不符合学界的需要,难以得到承认和利用,造成资料的浪费。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正是由于从事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开发的大多是爱好者,或为爱好学术的科技人员,或为爱好科技的学者。兼具两种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还极为缺乏,高等学校三、五年里也培养不出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科技人员与学者联合起来,共同开发。

再次,检索使用还缺少相应的规范和方法。尽管目前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的工作刚刚起步,但它带来的巨大便利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学者已开始自觉地将其应用到学术研究中。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方法,因此对能否利用电子文献、如何利用电子文献,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博士、硕士论文能否引用电子文献,能否将电子数据库、网络作为参考文献,对此,不同的学校单位有着不同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学者,由于陌生和隔膜,加上下文献数字化的学术水准还不够高,比较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对电子文献的利用作为一种取巧手段,明明利用了电子文献,又怕人说自己不用功,不愿意承认。更有一些人贪图方便,对电子文献形成一种心理依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愿意对电子文献进行复核,对电子文献之外的纸质文献不愿意下功夫查找。这些都是古代小说文献数字化开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学界需要形成一种对待小说电子文献的正确态度和有效应对措施,以形成一种普遍遵守的规范和方法。当然,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似乎有些超前,但未雨绸缪,这种工作还是值得去做的。

四、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极限性

中国古代小说的时间下限究竟应该划在哪一年,研究者还有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是二十世纪初还是1912年,有一个问题则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随着一段历史的结束,保存下来的古代小说文献的总量应该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讲,这些古代小说文献是应该有一个具体数字的,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确知。其间或之后,由于战乱、天灾人祸、保存不善等原因,还会有不少古代小说文献散失。因此,古代小说文献的数量只能是越来越少,而不可能越来越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小说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教育及学术制度的保障,古代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一直受到学界特别的重视,研究者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就收藏而言,古代小说文献越来越多地保存在各类公共图书馆里,呈现出集中收藏的趋势。目前,各类公共图书馆的收藏占据古代小说文献的绝大部分,民间收藏尽管也有,但数量并不多,将来也会逐渐向公共图书馆集中。这与二十世纪上半期个人收藏与公共图书馆收藏相抗衡、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完全不同。

就研究情况而言,经过研究者一百多年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寻访和搜罗,发现新古代小说文献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只要将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古代小说文献的新发现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情况进行对比,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随着人们搜罗古代小说文献的日益广泛和深入,随着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完善,开放程度的增加,随着电子检索等手段的使用,就理论而言,藏在各类公共图书馆乃至民间的古代小说文献迟早会有被全部掌握的那一天。这样,在经过若干年不断的穷尽式搜罗之后,势必会带来古代小说文献的极限问题。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将何以继,小说研究该如何面对这一现实,相信这不会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前文已经说过,由于古代小说文献先天就有不完备的缺憾,使小说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难以填补的空白,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作者、成书、版本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作品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会构成限制。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都不足以破解这些空白,尽管这方面的著述已经有很多。空白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于重要文献的新发现。以往人们还抱有幻想,幻想哪一天新的文献出来,彻底解决问题。如果文献的发现达到极限,那些盼望中的文献注定不会再被发现,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些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该如何持续下去呢。

就文献研究的趋势而言,后出转精是一个规律。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作品的校勘整理、资料的搜集汇编、书目的编制等工作无不体现着这一趋势。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完善,具有集大成意义及定本意义的古代小说文献整理成果也越来越多。从理论上讲,这一工作到一定阶

段,也会有一个极限,而不大可能是无穷尽的。未来有一天,当这一极限局面出现,而研究者又不愿意进行重复劳动的话,在这一方面还有多少工作可做,这一工作将如何持续下去呢。

空白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日趋完善。这样,再过 100 年或者 20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古代小说文献的研究工作还将如何发展呢?

尽管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古代小说文献研究还不够完善,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今天的研究者在有生之年还有不少工作可做,最起码在一、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之间还不存在这种极限问题。但将来呢?随着科学发展的突飞猛进,新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小说研究也随之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我们如今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比如几秒钟之内就可从上万种书籍内查找一个词语、人名,比如坐在家里可以从相关网站搜索自己所研究需要的材料,等等。这些都是前辈学者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而在今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

此外,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加入到小说研究的队伍,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数量比整个二十世纪 100 年内从事小说研究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整体发展前进的态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实际上都加速了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极限的到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证是,当下中国小说研究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已经变得越来越让学生和导师头疼,每年都有那么多的研究生,需要那么多的选题,想要具有原创性,想要不和别人撞车,实在是太困难了。如今都感到困难,再过三、五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情况又将如何呢?当然,这不仅仅是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未来面临的问题,其他领域文献研究相信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

因此,从一个学科整体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极限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绝非笔者杞人忧天,学界同仁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尽管这对学术研究生命通常只有三、四十年的我们来说,似乎遥远了一些。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